

Daxue Renwen Duben Ren Yu Guojia

大学人文读本

人与国家

◎夏中义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夏中义 主编

大学人文读本

人与国家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与国家 / 夏中义主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7

(大学人文读本)

ISBN 7-5633-3657-5

I. 人… II. 夏… III. 大学生—修养 IV. G6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500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cn>)

出版人: 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1 插页: 2 字数: 460 千字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 ~ 12 000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

◎ 夏中义

当我为即将付梓的《大学人文读本》(以下简称《读本》)伏案作序时,我明白,我所想写的,不仅仅代表我个人。

有人问:你们为何要编这套《读本》?

这可从两方面来回答。若着眼于建设性,《读本》旨在为当下中国大学生的“精神成人”提供系统的优质思想资源;若着眼于补偿性,则毋庸讳言,中国高校人文教育缺失久矣。

大学人文教育之长期缺失,实为结构性缺失。且不说现实社会对大学的期待,一般重在专业乃至功利,而非人文关怀;也不说大学生在校往往囿于学科分支细化而诱发人文视野萎缩,以致“学哲学太空,学历史太死,学文学太浅”,本属人文学科的文、史、哲尚且如此,更遑论非人文学科的理、工、医、农等专业了;即使是高校专职做学生工作的,也因偏于政治导向与心理调节,而无力亦无计从“精神成人”的高度来满足大学生对普世价值通识的人文渴求——虽然一个大学生从18岁跻身高等学府,到22岁本科毕业,本是其生命史特有的“灵魂发育”季节,他本就有权利要求大学设置有关“精神营养”教程;虽然一个现代意义的大学,当它刚从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崛起时,它便是以“精神城堡”的英姿,而非“职业培训所”的招牌,昭示于人类社会的。应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大学,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的北京大学,又如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南联大……然俱往矣,今非昔比,但无碍后人来日可追先哲。

《读本》应是一套普适性的青年知识分子修养读物,而不仅仅是大学人文系科的教参资料。这里所谓的“知识分子”,主要

是指专业学识层面上的创造者、传播者及运用者,它可以涵盖学界、思想界那些敢于担当人间道义的“精神战士”,但前者的外延显然比后者宽泛。至于“精神成人”,则是强调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应在本科期间初具“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潜质。其鉴别尺度之一,当是看其在学业之余,能否认真且持续地向自己追问“如何做人”这一终极命题,以及在何种价值水平上思索乃至践履此命题。而《读本》的创意正在于,欲引导读者从如下三个维度,展开对上述命题的思考:

第一,人与自我——你将如何为自身的日常生存注入意义,从而使生物学层面的个体生命真正转化为文化学层面的“主体角色”;

第二,人与国家——你将如何面对故土的百年沧桑及其社会——文化转型,以期将自己塑造成迥异于卑微子民的“现代国民”;

第三,人与世界——你将如何置身于新世纪的“全球化”格局,尝试用全人类而非狭隘族国的眼光,来关注我们这颗星球所发生的宏大事件与国际难题,诸如生态、种族、战争、宗教、人权……而无愧为“世界公民”。

上述三个维度或三大理念,实已暗示整套《读本》的构成框架或编纂规则:以理念分卷,按主词立章。所谓“以理念分卷”,是指每一分卷重在阐释一个理念,依次为:“主体角色”(第一卷);“现代国民”(第二卷);“世界公民”(第三卷)。所谓“按主词立章”,是指围绕给定分卷之理念,设置一串富有逻辑关联的主(题)词(如第一卷为“主体角色”理念设置的“人与自我”主词系列是:“大学”→“人生”→“日常”→“良心”→“青春”→“婚恋”→“女性”→“角色”→“勇气”→“遗嘱”),再依据每一主词内涵的深广延绵,来精心选文,有机组合,独立成章。简言之,若曰“理念”是贯穿“主词”系列的灵魂,则刻意编排的“主词”当是逻辑地支撑“理念”的骨架。

《读本》既然意在为大学生“精神成人”呈示根基性价值参照或“精神底线”,这便从根本上规定了《读本》内容,亦即选文须具备“思想性”、“可读性”与“经典性”。“思想性”、“可读性”无须赘言,“经典性”则重在辑录名家文字(内含著述、演讲、诗文、信函、奏章、碑铭、日记、随笔、格言、遗嘱诸多文体)。所谓名家,除了星辰般辉映 20 世纪人类文化星空的世界巨人外,《读本》还尤其

珍视如下三类中华英杰所贡献的思想瑰宝：一是1840年以降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与进步而鞠躬尽瘁的仁人志士；二是1916~1919年间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而疾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先驱；三是晚近20余年来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而不懈奋斗的社会精英。

这就意味着，《读本》所做的，实是在尝试现代人文视野的重新整合，即通过对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谱系的纵深勘探暨合理佩方，以期为大学生“精神成人”提供全方位、几近全息型的优质思想营养。这就明显越出了当下高校系科设置互为阻隔的基本格局，而使《读本》初步呈现出跨学科、又渐趋圆融的“大人文视野”。是的，若着意甄别惯常意义上的学科归属，《读本》可谓涉猎甚广，近乎学科“博物馆”，远不止文、史、哲、经、政，还有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科学哲学、科学史、精神史……但有趣的是，隶属上述学科的选文一旦被有机辑入《读本》所设定的语境，它又奇迹般地淡出原先学科圈，而让文本的每一个字甚至标点皆无声地用来澄明大学生“精神成人”时可能生发的困惑。由近代分工所铸成的高校系科的功能互阻，而今却在《读本》这一实验性思想平台消失于无形，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

诚然，《读本》不会忘记它的潜在读者首先是正在校园就读的大学生。大学生最终认同与否，可谓从根子上决定了《读本》的命运。为了让大学生在“灵魂发育”之际，能及时而确凿地听到另一种清醒而清洁的声音，《读本》颇讲究一个“贴”字。“贴”，要义有二：一是珍惜大学生内心的人文渴求；二是平等地正面应对大学生“成长的烦恼”——既不是居高临下地借权威语式来以偏赅全，也不是把人文教育柔化为慈善家的安抚，更不是放任自流，眼看一群群大孩子因挡不住时尚的诱惑而及时行乐，以欲念的满足来遮蔽人生真谛，却一筹莫展。

让《读本》平等地正面应对大学生的人文渴求，这既是编委的集体行为取向，也是对某种阅读理想的预设。若读者日后真能将《读本》之阅读转化为“灵魂对话”，这当是编者所梦寐以求的。由此不难理解本书为何要将每章编者絮语命名为“旁白”。“旁白”者，既含“参与”之意，又有“代庖”之戒也。毕竟“灵魂”之事，纯属个人精神事件，他者可供参照，无法代之思考。故在《读本》与读者之间，一个明智的编者只愿或只应扮饰如下角色：A.《读本》选编的思想资源大多是巨子或有分量人物的文字，而编

者恰似桥梁,望读者能通过编者的简介而与巨子相遇乃至对话;B.有些巨子的经典性思考远较坊间崇高,“高山仰止”,孩子一时难攀,编者便是阶梯,可借“旁白”把某些因深邃而艰涩的意思,深入浅出地说清楚,亦即当你想爬到巨人肩头看得更远时,请先站到编者肩上来;C.选文所蕴含某些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中外学界却未必能给出权威性定论,此时编者便有责任将巨子的思考乃至破绽,以及编者由此而生的疑虑,借“旁白”道出,企盼读者一起思考。

一部书稿,近百万字,好不容易编出来,末了却说编者对全书未必洞明若烛,相反,尚存疑点有待日后三思,这并非谦辞,倒是实话实说。

中国大学人文教育缺失既久,这便命定《读本》作为补偿性举措,近乎是在先哲曾经走过却又转眼荒芜的故土,重新踏出一条路来。我与我的编委一路走来,走了一年,似乎不曾有过“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豪迈。其间虽不缺“柳暗花明”之欣慰,那也是“山重水复”累月跋涉所致。是的,我不讳言《读本》是在尝试“大人文视野”之整合,但这片刚被整合的“大人文视野”对编者来说,无疑也很新,充满“陌生化效果”。我愿说我对全书构成早已廓然于胸,但我委实不敢说,我对《读本》每卷、每章乃至每篇选文对给定理念的细部阐释,也烂熟于心。我只是对与我专业相关的《读本》内容才有言说的自信。这就是说,面对《读本》所庄严展开的思想的宽银幕,我深感自己既是编者,同时也是亟须重新受洗的“教徒”,此“洗礼”所指亦有二:既指学识,更指灵魂。从这意义上,也可谓我和我的编委,是差不多与读者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我们不是传教士,也不是舍身为人间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我们所以从五湖四海聚到独秀峰下,齐心协力编《读本》,是因为我们皆祈愿能有这么一个机遇,可将曾真诚地感动过我们、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我们生命历程的那些思想暨文字,编成一本书,让现在那些渴望“精神成人”的大学生(其间将有我的孩子)也用心读一读,或许他们也会有所感动,有所思考。

最后,我要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其社长萧启明,责编赵明节、杨胜刚,感谢他们在《读本》一案所体现的出版家的眼光、气度与责任心。

我还要感谢我的尊敬的编委丁东(山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彬彬(南京大学教授)、李新宇(吉林大学教授)、刘锋杰(苏州大学教授)、邵建(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富华(浙江嘉兴学院副教授)、谢泳(山西省作家协会《黄河》杂志编辑),感谢他们为《读本》所贡献的睿智、协作精神与文化使命感。

谨为序。

2002 年春于沪上天忧草庵

本卷导言

◎ 李新宇

本卷所关注的主题是大学生如何成为一个现代国民。在一个人的“精神成人”过程中,不仅必然要面对个体自我的种种问题(如“人与自我”卷所述),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等一系列关系。因为人不可能拒绝一切社会组织而孤立地生存,而是必然要生活于各种特定的环境之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这些关系的构成原则却有文明与野蛮、健康与病态之分,关于国家的理念也有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之别。现代国民应该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然而,在传统厚重的国度里,现代公民意识的生成过程却往往艰难而又漫长。古老的专制主义传统笼罩之下形成的观念能够轻易地制造一代又一代卑微的“草民”和逆来顺受的“子民”、“顺民”或“良民”,却不能培育出现代公民。那些口口声声“吾皇圣明,奴才该死”的“臣民”显然不是现代公民,那些揭竿而起打家劫舍的“暴民”也不是现代公民。合格的公民应该能够走出专制主义造就的“顺民”与“暴民”的传统笼罩,清楚地认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应该能够清楚地意识到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意识到个人不可侵犯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事实上,从19世纪末那个帝国的黄昏开始,醒来的知识分子已开始为此努力。严复、梁启超、鲁迅、胡适、陈独秀,都曾为此而思索和呐喊。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工作没有能够得到继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不重视培养现代公民意识,恰恰相反,更惯于把人熏陶成缺少独立人格和思想能力的驯服工具。通过历史的遮蔽、信息的封锁和片面的知识灌输,一代人处于蒙昧之中,对历史事实模糊不清,对现代理念一无所知,甚至颠倒文明的基本价值,破坏人类的道德底线,是非不明、美丑不辨、善恶不分。这是“文革文化”的一大特征,也是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笔难以迅速摆脱的灾难性遗产。它严重污染着我们的精神,阻碍着我们与世界文明接轨,使现代化进程步履艰难,并且从根本上阻碍着我们生存状态的改善。

正是基于这一状况,本卷设置的重点有二:一是穿越遮蔽,激活历史记忆,直面民族百年历程的问题和矛盾;二是张扬现代国家理念,重铸现代社会伦理。

作为青年学子,应该知道这片土地的百年沧桑,认识前辈走过的坎坷路途,了解先驱者在风雨中留下的思想成果。我们走进了大学校园,便同时有了这份责任。否则,我们便无颜面对先驱,也无颜面对后来者。因此,本卷从“让记忆唤醒历史”开始,编选了一组反思苦难的文章。它可以提醒我们不忘历史的悲剧,并且正视生活的沉重。从这个沉重的起点开始,回顾 1840 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从洋务派的经济改革开始,到维新派的政治体制改革,再到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的文化革命和“立人”之举,古老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面对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启蒙与救亡,改良与革命,传统与现代,世界化与本土化……面对这些矛盾,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怎样的思考?为我们留下了怎样的思想遗产?虽然本书篇幅有限,但通过“重新点燃启蒙火炬”、“革命反思录”、“传统与变革”等章所选的文章,我们可以看到百年中国的种种矛盾和误区,也可以看到时代矛盾中所产生的思想。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问题。因为那些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全部成为过去。

要成为一个现代国民,就不能不具有现代国家理念。自由、民主、平等与公正,都是现代国家理念的关键词。早在一百年前,觉醒的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对这些理念的言说。“五四”时期陈独秀等人对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张扬,1920 年代末胡适等人面对新生的国家政权而进行的人权抗争,1940 年代储安平等人对民主的呼唤,都毫无疑问在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甚至在“文革”的血腥背景之下,身处险境的顾准仍然执著地思考着民主之路。虽然这些理念一直难以扎根,在某个特定时期,甚至全都成为被批判和否定的对象,但历史终于证明,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群,只要不想自绝于人类,就无法不接受这些现代理念。所以,那些在历史的艰难行进中留下的文字,自然闪耀着特别的光辉。这些文字与西方思想家的论述一起,构成了“自由思想档案”、“民主 ABC”、“平等与公正”、“个人·社会·国家”诸章,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什么是现代国家理念。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关系,其关键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国家?纳税人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利?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这种社会转型的标志何在?如何理解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如何理解平等和社会公正?从上世纪初到本世纪初,一百年了,一代又一代思想者,对此思考甚多。那些最具现代精神的思考应该成为我们走向现代的精神资源。

本卷最后一章讲的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中,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地扮演了现代化精神先驱的角色。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也成了中国现代化坎坷历程的一个缩影。“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的裂变中觉醒,主动承担起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神圣使命。他们因此而创造了自身的辉煌。然而,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他们却一步步陷落,直至成为改造的对象。这一切的成因主要在于外部,但知识分子人格和精神持守却也值得认真反省。因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常常伴随着知识分子的迷思和误入歧途。因此,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清楚知识分子的责任,了解知识分子的姿态和风采,显然是必要的,因为文明的发展毕竟需要成熟的知识分子的群体承担。

目 录

本卷导言	1	李新宇
------	---	-----

第一章 让记忆唤醒历史

社会记忆	3	康纳顿
记忆即生命	6	徐友渔
“抢救失足者”	10	韦君宜
大跃进亲历记	15	李 锐
“文革”博物馆	19	巴 金
我们的父亲刘少奇	22	刘平平等
青春是可怕的	25	钱理群
托 付	27	刘烨园
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	31	筱 敏
书厄小史	36	散 木
编者旁白	39	李新宇

第二章 传统与变革

新的！旧的！	43	李大钊
灯下漫笔	46	鲁 迅
破 坏	50	傅斯年
文化的变化与进步	52	蒋梦麟
中国文化之出路	56	陈序经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60	胡 适
自信力与夸大狂	63	梁实秋
论传统与反传统	66	王元化
“东方文明”琐议	71	严 秀

编者旁白 75 李新宇

第三章 重新点燃启蒙火炬

“什么是启蒙运动?”	79	康德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85	李泽厚
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	89	陈独秀
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91	李中
《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	97	牧惠
“皇帝来哉”	104	刘洪波
编者旁白	106	王彬彬

第四章 革命反思录

旧制度与大革命	111	托克维尔
我们的政治主张	114	胡适
中国近百年来革命思想道路	118	张灏
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	124	单世联
“路标”改变以后:世纪初沙俄改革		
与自由知识界的悲剧	129	苏文
格瓦拉为什么出走	135	程映虹
其兴也勃	141	潘旭澜
编者旁白	145	王彬彬

第五章 自由思想档案

关于新闻自由	151	休谟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	153	马克思
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	160	李大钊
论思想统一	162	梁实秋
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167	储安平
言论自由与反民主的少数	170	科恩
四大自由	173	罗斯福
自由主义的前途	175	米瑟斯

编者旁白 179 谢 泳

第六章 民主 ABC

民 主	183	阿克顿
对于民主的再思考	185	陈独秀
民主与“终极目的”	189	顾 准
华盛顿的选择	193	傅国涌
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196	阿玛蒂亚·森
编者旁白	203	谢 泳

第七章 平等与公正

三个神圣的词	207	勒 鲁
自由与平等互利	212	托克维尔
资本主义和平等	215	弗里德曼
对内的平等	217	王造时
三种社会体制	221	张五常
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分配法则畸变	225	何 迪
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	230	李昌平
威海忧思	234	魏明伦
平等、价值和功能	236	哈耶克
编者旁白	241	谢 泳

第八章 个人·社会·国家

易卜生主义	245	胡 适
个人与国家之界说	250	杜亚泉
随感录二十八	253	钱玄同
国民人格之培养	254	张奚若
“公仆”之名不能成立论	257	邵燕祥
良民的标准	259	苏中杰
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型	261	茅于軾 周鸿陵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263	萧雪慧

论公民的不服从	268	梭 罗
公民社会	274	达仁道夫
编者旁白	277	李新宇

第九章 什么是知识分子

关于知识阶级	281	鲁 迅
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	284	殷海光
民主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功能	286	霍 克
知识的责任	291	罗家伦
知识分子的责任	296	哈维尔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300	储安平
左拉与德雷福斯案件	303	贝尔纳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308	陆键东
中国作家与精神气候	314	林贤治
编者旁白	320	李新宇

第一章 让记忆唤醒历史

- 社会记忆 —— 康纳顿
- 记忆即生命 —— 徐友渔
- “抢救失足者” —— 韦君宜
- 大跃进亲历记 —— 李 锐
- “文革”博物馆 —— 巴 金
- 我们的父亲刘少奇 —— 刘平平等
- 青春是可怕的 —— 钱理群
- 托 付 —— 刘烨园
- 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理想 —— 筱 敏
- 书厄小史 —— 散 木
- 编者旁白 —— 李新宇

社会记忆

康纳顿

美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我们应当把社会记忆和最好称之为历史重构(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的活动区分开来。过去的全部人类活动,只有通过了解其遗迹才能加以了解。无论是罗马要塞里掩埋的遗骨,还是作为诺曼城堡惟一残留的石堆,或者是其使用或方式显露了一种习俗的希腊石刻中的一个词,还是由某个场景见证人写的口述记录,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是遗迹:即其本身已无从知道的某种现象所留下的可感知标记。仅就把这种标记理解为某物的遗迹和证据来说,它已经超越了仅限于叙述这些标记本身的阶段;把某物算做证据,是就他物,即证据所指的对象,进行陈述。

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做法是推论。他们对证据的研究,就像律师在法庭上反诘证人,从证词析取不明显包含的信息,甚至和其中包含的公开声明相反的信息。由先行陈述构成的那部分证据,绝不占优势;在历史学家看来,据称属实的一段先行陈述,和其他类的证据并无优劣之分。历史学家能够拒绝被告知作为证据的事物,代之以自己对事件的解释。即便他们接受先行陈述的内容,那也并非由于那段陈述的存在而被视做权威,而是由于经过判断认为它符合历史学家关于历史真实性的标准。历史学家远非依赖他们在思想上必须保持一致的自我以外权威的陈述,他们是自己的权威;他们的思想相对于他们的证据是自主的,就是说,他们有用来批评证据的标准。

因此,历史重构不依赖社会记忆。即便历史学家不能根据连贯的传说,从见证人那里得到有关一个事件或者习俗的陈述,他们依然能重新发现被完全遗忘的东西。历史学家可以这样做,部分是通过考释其文献资料中包含的陈述——这些陈述声明或暗示有涉及历史学家主题兴趣的所谓事实;部分是通过利用我们所说的非文本资料,例如涉及同样主题的考古资料,把这些说成是非文本资料的目的,是要表明,由于